



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研究文库
■ 西北边陲史地研究丛书 ■

丝绸之路研究

田澍 何玉红◇主编

交通与文化



西北边陲史地研究丛书
交通与文化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研究文库
■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

丝绸之路研究

交通与文化

田 澍 何玉红◇主编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研究:交通与文化 / 田澍, 何玉红主编.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3.10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ISBN 978-7-5490-0498-0

I. ①丝… II. ①田… ②何… III. ①丝绸之路—研究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9795 号

丝绸之路研究:交通与文化

田 澍 何玉红 主编

责任编辑: 原彦平
封面设计: 苏金虎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gswenhua.cn>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 编: 730030
印 刷: 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黄河北玉垒关 23 号
邮 编: 730000

开 本: 787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90-0498-0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田 澍

副主任：刘再聪 何玉红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辉 伏俊琰 李并成 李迎春 李建国

李晓英 李家莉 沙武田 尚季芳 张 兵

张 嵘 张德芳 杨惠福 杨鹏飞 俄 军

胡小鹏 秦丙坤 黄兆宏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由

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考古学、中国史、民族学、世界史重点学科

资助出版

前 言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长期稳定和最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学术积淀深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西北疆域演变与国家稳定、西北边疆环境变迁、西北边疆民族宗教问题、西北边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充分利用便利的地域优势，主动适应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在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开展系列学术科研活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一、编撰专题学术著作。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学术专著有五十多部，其中主要有：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史研究》，季成家等《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赵向群《五凉史探》，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侯丕勋、刘再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李清凌《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田澍《西北开发史研究》，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社会研究》，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研究》，田澍、陈尚敏《西北史籍要目提要》，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李建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等。这些学术著作或以主题探讨为主，或以资料汇集为主，内容系统、全面，且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二、承担各类科研项目。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八十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王三北《中国历代西北开发思维和苏联对外政策》，赵汝清《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李清凌《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研究》，田澍《明清中央政府与蒙藏民族地区政治互动策略研究》和《十四到十六世纪明蒙关系的走向研究》，刘再聪《唐

朝“村”制及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研究》和《唐朝“村”聚落形态与基层行政制度“西进化”历程研究》，李并成《历史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研究》，李晓英《近代甘宁青回族商人研究》，连菊霞《宗教信仰与族际通婚——以甘肃积石山县保安族、回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例》，尚季芳《近现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问题与社会控制研究（1840—1960）》，胡小鹏《晚清至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社会群体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潘春辉《清至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村用水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李建国《近代西北地区商贸经济及对当地社会发展影响问题研究》，王新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代中国西北考古研究》，张嵘《我国社会现代化历程中的少数民族发展研究》，刘清玄《天水麦积山石窟洞窟题记释录与研究》，张荣《哈萨克问题与清代西北边疆安全》，李永平《甘肃新出土魏晋十六国文献整理研究》等。这些项目围绕与西北边疆史地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内容展开研讨，主题集中，针对性强。

三、召开系列学术论坛。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有：“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庆贺蔡美彪先生八十华诞暨元代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11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文化学术研讨会”，“河洮岷历史文化与甘肃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高层论坛”，“甘肃历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甘肃远古文化与华夏文明高层论坛”，“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高层论坛”等。这些论坛吸纳国内外知名专家就当今西部大开发、西北边疆安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西北生态保护、西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等前沿课题展开集中研讨，提供学术咨询，具有较强的服务社会与政策咨询功能。

四、加强机构和学科建设。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取得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发展。2010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获批为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国内专门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水平科研平台。目前，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互为依托的科研平台有中国史一级博士点、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互为依托的平台之间相互推进，同步发

展。2006年以来,《敦煌学教程》、《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等8部本科生系列教材先后出版,在国内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方面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3年,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学四个学科同时获批为省级重点学科,使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建设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五、重视持续发展。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围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高水平论文学术七百余篇,不少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截止2009年,汇聚阶段性成果的学术丛书《西北史研究丛书》十册本最后出齐。为了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能够获得进一步、持续性顺利发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应运而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编撰,必将不断深化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度,拓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视野。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必将得到持续发展的事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目 录

张骞使西域路线考	黄文弼 (1)
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	黄文弼 (3)
汉代河西走廊东段交通路线考	李并成 (8)
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	陈守忠 (18)
炳灵寺石窟与丝绸之路东段五条干道	李并成 (31)
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	赵 贞 (43)
简牍和考古所见汉代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交往 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李永平 (59)
景泰境内丝绸之路黄河渡口的两个繁荣期	刘再聪 (69)
汉将霍去病出北地行军路线考 ——《汉书》“涉钧耆济居延”新解	陈秀实 (77)
元狩二年霍去病西征路线考释 ——兼谈汉唐时期东段丝绸之路北道	黄兆宏 (81)
两汉允吾、金城再考	陈守忠 (91)
汉金城郡乌亭逆水、涧水考	王宗元 (99)
汉金城郡令居县故城考	王宗元 (110)
媼围城的位置与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走向	刘再聪 (116)
金城关的变迁	陈秀实 (123)
丝路古国——阿兰考略	苏金花 (126)
汉唐时期“河陇”地理概念的形成与深化	杨发鹏 (134)
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	金宝祥 (146)
“汗血马”诸问题考述	侯丕勋 (164)
明代河西走廊境内的西域贡使	田 澍 (173)

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	田 澍 (185)
汉唐间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	刘曼春 (199)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宗教文明	刘再聪 (210)
西夏女兵及其社会风尚	何玉红 (220)
论丝绸之路沿线古城遗址旅游资源的开发	李并成 (231)
世界遗产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田 澍 李勇锋 (236)
从“过境旅游点”看甘肃旅游业的发展前景 ——以陇南和白银为中心的考察	刘再聪 (243)
后记	(251)

张骞使西域路线考

黄文弼

张骞使西域，前后共两次，第一次为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使大月氏，元朔三年（前126年）还，居外凡十三年；第二次为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使乌孙，元鼎二年（前115年）还，去来凡五年。

第一次经行路线，据《史记·大宛传》所述，骞与堂邑父俱出陇西，经匈奴，留十余岁，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按是时，甘肃西部及天山北部，均属匈奴，自冒顿单于攻走大月氏，匈奴西部南与羌接，西接乌孙，而康居安息，俱近匈奴，为其役属。时骞既为匈奴所得，传诣单于，时单于庭治外蒙古鄂尔浑河一带，如由此西走，必西南出阿尔泰山，经准噶尔盆地，过乌孙国北境，西南行至大宛。一说骞出陇西，必为浑邪王所得，浑邪王领地，即今酒泉、敦煌一带。北为呼衍王领地，今天山东部哈密、镇西一带。骞虽传诣单于，然史称居匈奴中益宽，故其逃亡之地，不必发自单于庭，必游荡与浑邪、呼衍之间，乘隙沿天山北麓，出乌孙国南境而至大宛。按《史记》称汉使至乌孙，或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可证。今从后说。

又史称骞至大宛后，大宛为发导译抵康居，康居传至大月氏，时大月氏已臣大夏，而居妫水北为王庭，骞又从月氏至大夏。按康居在大宛西北，大月氏在大宛西，骞至月氏，何故绕道康居，是不可不求之当时各国形势。按大宛国以今费尔干盆地为中心，南阻大山，王治贵山城，即今纳林河北岸之喀山，喀山、贵山，一声之转。康居在今锡尔河北岸，以塔什干为中心，即康居王冬日游牧之越匿。卑闾城在其北，为康居王都，实不常住。一说康居国境西南拓展至撒马尔干一带，为康居小

王附墨苏薤领地，南与大月氏之都密翎侯领地相接。大月氏以阿姆河为中心，击臣大夏而居蓝氏城。故骞欲自大宛至大月氏，西南阻于丛山，路不可通，必沿纳林河西行，经康居越匿境，而至撒马尔干，又南行经康居小王苏薤领地而至大月氏之都密，达蓝氏城。一说张骞使西域时，康居国境尚小，仅以锡尔河北岸为限。大月氏过大宛西行，初未尽南迁，一部分尚游牧于撒马尔干一带，康居为其役属。及大月氏南臣大夏，徙都蓝氏城，康居国境西南遂拓展至撒马尔干，此是后事。故骞从大宛径西行，经康居境，即直抵大月氏。时大夏在其南，故骞又从月氏至大夏，此为路线所必经，并非绕道苏薤领地。按《史记·大宛传》，称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若如前说，则大月氏在大宛西南，与《史记》不合。故从后说。

次述归途。居《史记·大宛传》所述，骞留月氏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与胡妻堂邑父俱亡归汉。按《汉书·西域传》，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时骞以至大夏。由大夏东归，必遵循南道，过帕米尔，出莎车，傍昆仑山北麓，经和阗、于阗、鄯善。羌今青海地；盖骞欲自鄯善，过阿尔金山至青海归，后为匈奴所得。观张骞为武帝言扞采、于阗事可证。如云：“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若非身至其地，不克详明如此。故从之。

第二次使乌孙路线，史无明文。但出使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史称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汉，金城河西西并南山，空无匈奴。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于是河西之地，始属于汉，无复为行旅之患。故骞使乌孙，必由敦煌西行，过盐泽而至楼兰，沿孔雀河及塔里木河西北行，而至龟兹，即今库车。一说由库车西行至乌什，西北过木素尔岭之西，即《新唐书·地理志》之拔达岭，而至乌孙，乌孙治赤谷城，即在今依斯色库尔之南岸。一说乌孙故牧地，当以今伊犁河谷为中心，赤谷城当在今特克斯川或伊犁一带。骞至乌孙，即由龟兹西北行绕木素尔岭之东，西至伊犁河谷，并不绕道乌什。按据《汉书》所述，汉遣常惠使乌孙，合五万人攻龟兹。又乌孙公主遣女来京师，过龟兹。是汉时通乌孙道，以龟兹为中心。故从之。《魏书》云：乌孙治赤谷城，后西徙葱岭中。则由乌什出拔达岭至乌孙道，或为汉以后之道也。今不从。

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

黄文弼

按两汉通西域道路，原有南北二道。《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言词甚为简约。以我研究的结果，疑《汉书》所述为后汉通西域路线。与西汉通西域之路线，则有差异。按《魏略·西戎传》云：“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庐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至龟兹为新道。”（《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由《魏略》所述，以校《汉书》，除南道以婼羌易鄯善外，余均同。惟所述之新道，实即《汉书》之北道。而中道转为《汉书》所不记。今以考察所得，参合《史记》、《汉书》所记，知《魏略》之中道，即西汉时期之北道。后汉时之北道，即《魏略》之新道。班固以后汉之道路，系之于前汉，误矣。试述如下。

《史记·大宛传》：“宛国饶汉财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颜师古注《汉书》曰，绝邑，言近道之处，无城郭之居也）又云：“贰师将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又云：“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

粟，以给使外国者。”按《史记》之盐水，即《汉书》之盐泽。时楼兰在泽之西，匈奴在泽之北，数为行旅之患。故《汉书·西域传》称：“贰师将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路绝无通。”故云北有胡寇，盖指匈奴。在盐泽之东，玉门关以西，为白龙堆沙地，地无水草居民。由今罗布泊东北盐壳地带，可以证明其然。故《汉书·西域传》称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与《史记》“出其南，乏水草”“绝邑乏食”正同。由此言之，是李广利伐大宛所行之路，即由于门关西行北，过龙堆，经罗布泊北岸，直西经楼兰，至龟兹，与《魏略》所述之中道相合。李广利伐大宛，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太初四年（前101年）还京师，皆西汉时事也。

再以我所考察者证之：我在1930年春赴罗布淖尔考察，在淖尔北岸之一三角洲中，觅得古烽燧亭遗址一区。墙基犹存，亭上有竿五，南北骈列，盖为当时举烽火之具。亭东北隅，有房屋遗址，疑为官长所居，以芦苇为墙，间以咸块。发掘其下，发现木简漆器、服履之属甚多。木简长八寸，宽三分。墨书隶字，有黄龙、永和、元延诸年号，洵为西汉故物，器物时代亦颇相当。自元延以后，即不见有何文字，故疑此遗址，在西汉时为最活跃时期。自王莽以后，势力浸微矣。

我第二次去新时，复至罗布淖尔古烽燧亭工作，又发现木简数枚，有记行人来往之词。在亭北五里许，有古道一；东西向行，盐层开处，中现通途，蜿蜒湖畔，有若游龙。在道两旁，时拾得五铢钱，及碎铜件之类，想必为行人所遗。以遗物证之，当与烽火亭有关系，且为同一时代所遗留也。

时楼兰与龟兹、仑头为直线。李广利出师大宛，虽分南北两道，而其北道必由此路行，故有屠仑头之举。且须经过此地。盖由此往东为盐水，有白龙堆沙碛；由此往西，有库鲁克河，为淡水，可溯河而西。故武帝诏书，有“从泝河山，涉流沙”之语，盖为此也。自李广利破大宛后，“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见《史记·大宛传》）是此亭或即为武帝破大宛后所设，亦未可知也。据此，则汉初之北道，即《魏略》由玉门关西北过龙堆，到楼兰，直诣龟兹之径道。时车师在北，与匈奴为邻，不当孔

道。虽宣帝时日逐王降汉，郑吉攻破车师，兼护北道；然由玉门关出五船北，至车师之新道，仍未通行。《西域传》云：“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按《太平寰宇记》述元始中之三道，其述新道云：“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转西与中道合，至龟兹，为新道。”与《魏略》所载之新道同。其述中南两道，亦复一致。是《魏略》中之三道，乃元始中之三道。但其新道终厄于车师后王姑句之阻，未见通行。及王莽之乱，西域复绝。故终西汉之世，其通西域只有南中两道也。及后汉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命将北征，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后复为匈奴所据。至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三年，班超遂因之以定西域。和帝死，西域又叛。延光四年（125年），安帝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田柳中，如永元故事。置伊吾司马一人以镇守伊吾，而西域之道复通。但此道为《魏略》中所述之新道，即由伊吾以至车师者，与西汉之径道有异也。《后汉书·西域传》云：“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西域之门户也。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据其所述，与《魏略》所载出五船北之新道相合。伊吾即今哈密地，五船虽不详其地址所在，但必在伊吾附近，即今哈密一带也。是后汉通西域之路，只有南北二道。而北道即《魏略》中所述之新道，中道在后汉已渐近衰微矣。虽安帝元初中，班勇请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经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但终不见用于安帝，而于延光中出屯柳中矣。柳中即由伊吾至高昌所必经之地，亦即玉门关西北出五船至车师所必经之地也。据上所述，则后汉之北道，即《魏略》之新道，而西汉之北道，即《魏略》之中道，无可疑也。至斯文赫定所发现楼兰遗址，所得木简为晋太始以后事，与汉通西域道路无涉。斯坦因以此为汉通西域古道所必经之地，误矣。

次所欲论者，西汉初何以择此险道，后汉又何以改道？欲答此问题，须先明匈奴在当时之形势。

匈奴自冒顿为单于后，势渐强大，尽灭北方诸胡，与汉接壤。置左右贤王，以左王居东方，直上谷。右王居西方，直上郡。右贤王地又与氐羌相通往，氐羌在长安之西，即今甘肃、青海等地。故汉初西北两面，均被迫于匈奴与氐羌。匈奴累为边境之患，致高祖被困于平城。武帝之初，虽累遣大将军攻击匈奴，匈奴渐次西北徙；然西域诸国，亦与匈奴接壤，服属匈奴，如乌孙、车师，是其例也。故武帝欲保汉土之安全，必须行下二策：即一、隔绝羌、胡交通；二、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及汉元狩中，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空其地，以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益西北徙。羌、胡交通，自是断绝。故武帝第一策，已完全达到。再说第二策。初张骞奉使西域，还言联络乌孙、大宛之利。武帝从其言。元封中，遣使与乌孙和亲，以公主妻乌孙王，俾与乌孙夹击匈奴。又派贰师将军击大宛，围车师，以威西国。西域诸国，亦遣使来贡献。轮台、渠犂，置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是皆为武帝第二策之表现。然汉由白龙堆过楼兰至乌孙、大宛，必须经过极长之险道。时匈奴虽已西北徙，然与西域诸国相接，车师服事匈奴，共为寇钞。又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尝居焉耆、危须、尉犂间。汉使至西域，必须过车师、尉犂、焉耆之南境，即沿塔里木河旁之沙地，过龟兹以至乌孙。楼兰与车师南北相值，当汉道冲，设车师与楼兰联络为一，以阻汉道，则汉与西域交通立时断绝。故保障通道安全，当为汉代之急务，楼兰即其重要之地也。又西域诸国，虽一时服属于汉，而又被迫于匈奴，时离时合。故汉代欲通西域，非取得楼兰为据点不可。武帝死后，昭帝因楼兰王为匈奴反间，即立傅介子刺杀之，并屯田于伊循城。而以故楼兰为军事与运输之重地。例如宣、元之际，设都护，置军侯，开井渠，积食谷。由盐泽以至渠犂，亭燧相望，皆为布置军事与运输之重要政策。而汉亦得以安稳渡过艰险之长廊沙地，无复后顾之忧。武帝之第二策即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至是乃完全成功。《水经注》称楼兰王迁伊循城，乃尉屠耆惧为前王子所害，自请于天子者，并非真实原因。

及前汉之末，哀、平年间，内政不修，中原和西域交通断绝，西域诸国自相分裂为五十五国。及王莽篡立，贬易诸侯王，西域怨叛，与汉绝，而役属于匈奴。光武初定，亦不遑远事。时西域诸国，复自相攻